

文章编号: 1000-5862(2018)01-0031-07

制度成本与 OFDI 的贸易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聂爱云¹, 何小钢², 黄若伽³, 华梦清²

(1.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3.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从母国制度成本入手, 将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投资动机、反向溢出理论与制度成本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内, 探讨制度成本对 OFDI 投资动机、反向溢出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在控制地区市场化程度之后, OFDI 对母国的贸易效应不再为正, 而是转为显著的负面效应; OFDI 对母国的反向溢出及其贸易效应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特征; OFDI 对母国的贸易效应依赖于母国制度环境, 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 OFDI 对地区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强。降低制度成本对于促进对外开放与国内经贸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

关键词: 制度成本; OFDI; 贸易效应; 制度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 062; F 426; F 11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57/j.cnki.issn1000-5862.2018.01.06

0 引言

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1-2]。自200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 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实行 OFDI 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扩大。根据安永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望 2015》, 2011—2014 年, 在全球 OFDI 呈较大幅度下滑趋势的大背景下, 中国 OFDI 却逆市上扬,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6%。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促进还是替代了母国的出口贸易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3]。在中国企业大规模、大范围“走出去”的背景下, 自然要问: 对外直接投资究竟促进还是替代了对外贸易? 现有研究发现: OFDI 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因对外投资投向的国别、所在行业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 而且 OFDI 对进口和出口的促进和替代效应也是不同的^[2-5]。然而, 什么因素导致中国 OFDI 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已有研究并未给出很好的答案。而且, 现有关于 OFDI 贸易效应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国别视角^[4-6], 少数学者关注到省级层面 OFDI 与对外贸易的关系^[7]。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通过 OFDI 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缓解对外贸易下降带来的冲击、稳步提升我国的开放利益和对外话语权, 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热点课题。与此同时, 随着福耀集团等企业走向欧美实施 OFDI, 关于“降低制度成本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的讨论日渐兴起。本文从各省制度成本的视角研究各省不同制度成本导致的 OFDI 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丰富和推进现有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理论, 扩展其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对于有效地稳定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OFDI 是促进还是替代了出口? 早期的局部均衡模型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是替代的。P. J. Buckley 等^[8]研究发现, 出口虽然不需要承担外国生产的固定成本, 但面临高额的贸易壁垒、运输成本等, 而 OFDI 虽然降低了运输成本、贸易壁垒, 但却承担了在国外生产的固定成本, 因此, 在国外市场规模足够大时会选择 OFDI, OFDI 形成了对出口的替代。然而, 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却发现, OFDI 与出口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部分国家表现为促进效应, 另外一部分则表现为替代效应^[9]。B. A. Blonigen^[10]认

收稿日期: 2017-06-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63033, 71463022),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4YJC790090),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7BAA208023)和江西省教育厅科技课题(GJJ150472, GJJ150368)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聂爱云(1978-), 女, 江西新干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 OFDI、制度与企业创新的研究。E-mail: nieaiyun@126.com

为,之所以产生促进或者替代效应的关键在于 OFDI 在东道国生产的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若生产最终产品则替代出口,反之则促进出口;若既有中间产品又有最终产品,则 OFDI 与本国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关于中国 OFDI 的贸易效应,已有研究主要从跨国层面对此进行研究。项本武^[11]采用 2000—2006 年中国对 50 个国家(地区)的投资和出口数据,使用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 OFDI 的贸易效应,发现 OFDI 与出口、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张春萍^[6]发现中国 OFDI 具有显著的进出口创造效应,并且在资源丰裕国家表现最强。陈俊聪等^[7]发现,OFDI 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进步的加速器,但是 OFDI 并未促进出口。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框架,胡兵等^[4]研究表明,中国 OFDI 总体上对出口贸易形成替代效应。具体来看,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地促进中国的出口,而对发达国家的 OFDI 则抑制了出口。王胜等^[5]运用 2003—2011 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OFDI 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 OFDI 会增加进出口贸易量,对新经济体及其资源不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OFDI 减少出口贸易量,但对进口贸易量影响不显著。

大量研究探讨了制度成本、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随着制度对贸易、增长的文献不断兴起,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优劣决定了 FDI 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制度质量越高,FDI 的正向效应更大^[12]。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从母国制度环境入手研究了制度对 OFDI 的影响。M. A. Witt 等^[13]认为由于制度约束的普遍存在,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在发展阶段的早期就开始实施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以逃离本国制度约束,并据此提出了“制度逃逸论”。不良的母国(地区)制度环境导致本国企业在国内的生产经营风险增大,企业有动机通过寻求国际化策略来躲避国内制度制约。裴长洪等^[2]考虑了母国国家整体在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重要性,指出母国的收入水平、产业发展水平是 OFDI 的基石,因母国发展条件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行业优势、区位优势 and 规模优势以及其他特定优势,这些优势对本土企业进行 OFDI 具有重要意义。K. E. Meyer 等^[14]从组织和战略的角度研究发现,不同制度环境将会导致外资进入的方式不同;进一步地,还会导致 OFDI 对母国经济效应的不同^[15]。

现有文献为研究制度环境与企业走出去提供了

基本借鉴,但是从母国制度成本的视角研究 OFDI 经济绩效的文献仍然较少,特别是针对像中国这样的制度转轨大国,研究制度成本对跨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贸易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制度成本影响 OFDI 贸易效应的理论机制

近年来,制度环境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在研究 OFDI 时关注的重点对象,并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14-17]。制度概念比较宽泛,其中涉及法律、文化、产权保护、社会风俗等内容,而在所有制度相关的因素中,产权保护在解释经济绩效中最为关键^[18]。母国制度成本对于 OFDI 企业的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增进市场机制的支持型制度(Market Supporting Institutions)将为 OFDI 与本地企业的前后向关联、溢出提供便利^[14-15]。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制度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在对外投资、并购过程中的不同响应方式^[19]。然而,中国各省区(市)不同的制度成本会如何影响 OFDI 的贸易效应、制度成本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 OFDI 贸易效应的机制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制度约束,主要表现为各地区严重的市场分割、金融制度扭曲、产权保护不足与法律制度不健全以及政府激励制度扭曲等^[20]。长期的制度约束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制度成本,直接影响到 OFDI 走出去的模式及其海外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 OFDI 与发达国家的 OFDI 在组织行为、进入模式、区位选择、流入行业、流入规模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环境的差异^[14-15, 19]。母国制度约束的存在,会导致国内企业在走向成熟之前就开始实行 OFDI,此时企业自身技术、管理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国内企业的逆向溢出。而且,制度成本过高会影响 OFDI 企业的行业分布,技术含量低的资源型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体。从产业链上来看,制度成本较高容易导致更多无益于带动贸易的水平型 OFDI,而促进本国贸易的垂直型 OFDI 走出去规模不大。制度成本成为弱化 OFDI 与母国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因而也可能弱化 OFDI 对本地贸易的带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走出去投资主要会选择初级最终产品的生产,终端产品无法带动本国的进出口^[10],制度约束下容易形成 OF-

DI 对本国贸易的替代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还有可能存在制度逃逸型 OFDI。根据“制度逃逸论”^[13],制度环境不好的国家(和地区)会迫使其所在地的公司投资海外,母国制度约束将激发企业更多更早地走出去投资。偏向于国有企业的银行融资、税收征管以及产业政策会将私营企业排除在一些核心行业以及行业的核心板块之外,具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为了规避这种偏向性管制政策会选择进军海外,通过海外投资或者海外迂回投资国内以提升国际竞争力^[13]。与此同时,由于所有制原因,制度约束越强的地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可能越容易体现国家(国企)意志,而非企业的经济收益,这类 OFDI 会更少地带来贸易效应。此时,企业所有权与制度逃逸产生交叠效应,弱化 OFDI 对本土的贸易促进效应。

综上所述,如图1所示,母国制度成本的降低将会决定 OFDI 的行业分布与类型,影响 OFDI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进一步通过影响 O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与母国的经济联系,最终形成对 OFDI 贸易效应的影响。与此同时,制度约束可能导致制度逃逸型

OFDI,加上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约束,这2者叠加在一起将极大地弱化 OFDI 对母国的贸易效应。

母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制度成本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微观动机与企业战略,这是以往宏观分析所忽略的,而且揭示制度对 OFDI 企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有助于拓展以往跨国公司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走出去行为的解释,有益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跨国企业(Chi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简称 CMC)的投资行为^[16,19]。制度视角的一个优点在于能够弥合跨国投资企业的微观动机与 OFDI 的宏观经济效应,便于有效地将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加以融合,更为深入地理解、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及其后果^[17]。中国跨国公司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在国内经营环境、所有制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所处的母国制度环境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母国制度环境“特殊性”可能会导致中国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行为、战略等方面上呈现出不同特征。因此,中国各地区制度成本如何影响 OFDI 的贸易效应值得进一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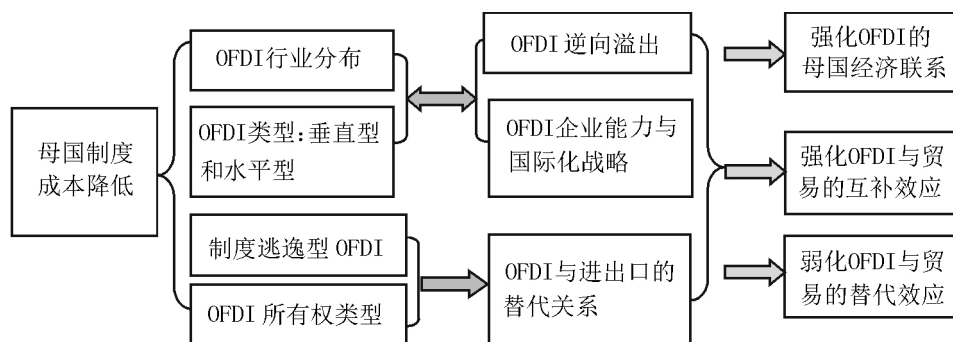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成本影响 OFDI 贸易效应的作用机制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与变量

为了讨论中国各地区制度成本对 OFDI 贸易效应的影响,以中国各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OFDI 的贸易效应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量来衡量。分省制度成本或称制度质量指标采用樊纲等^[2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中的相关数据构建而成,这些指标在已有文献中被广泛采用。由于制度质量指标数据只到 2010 年,所以面板数据截至 2010 年。

因此,本文选取中国 28 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缺失,香港、澳门、台湾、海南、西藏除外;同时,重庆与四川合并) 2003—2010 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参照聂爱云等^[20]的做法,采用(1)式所表示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O_{pit} = \beta_0 + \beta_1 L_{oit} + \beta_2 M_{kit} + \beta_3 L_{oit} M_{kit} + \beta_4 F_{gdpit} + \beta_5 C_{gdpit} + \beta_6 L_{gdpit} + \beta_7 I_{nit} + \alpha_i + \gamma_t + \xi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O_{pit} 表示地区 i 在 t 年的贸易总量; α_i 和 γ_t 分别用来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 L_{oit} 是主要解释变量之一,在模型中采用的是各省 OFDI 的流量和存量的对数,以便于考察 OFDI 对本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短期效应以及长期累积效应,所有数据都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值;总市场化指数 M_{k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对于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市场化指数 M_{kit} 的构建方法和具体涵义,可参见文献[21]中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他控制变量分别为地区 FDI 占

GDP 比例 F_{gdpit} 、政府消费占 GDP 比例 G_{gdpit} 、地区 GDP L_{gdpit} 和各地第 2 产业比例 I_{niu} 。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相关的各省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等;制度质量相关指数来自文献[21]中的中国市场化指数。通过皮尔逊(Person)相关系数矩阵考察了主要解释变量 OFDI 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度,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 OFDI 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M_k 、 L_{ofit} 、 G_{gdpit} 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不会对实证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制度等变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为了有效地控制这种特征,在实证检验中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分别为回归模型中 γ_i 和 α_i),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20]。出于稳健性的考虑,采用固定效应,以避免由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可能与模型的解释变量相关而导致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系数有偏或不一致等潜在的问题发生^[22]。

表 1 制度成本、OFDI 流量与 OFDI 贸易效应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L_{of}	0.01*** (0.00)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3** (0.01)	-0.06*** (0.01)
M_k		-0.0200 (0.03)	-0.0200 (0.03)	-0.0200 (0.03)	-0.0400 (0.03)	-0.09*** (0.03)
M_{kof}		0.004** (0.00)	0.004** (0.00)	0.005** (0.00)	0.005** (0.00)	0.009*** (0.00)
G_{gdp}			0.65** (0.32)	0.63** (0.32)	0.70** (0.33)	0.77** (0.30)
F_{gdp}				-0.001 (0.00)	-0.001 (0.00)	-0.001* (0.00)
L_{gdp}					0.110 (0.13)	0.26** (0.12)
I_n						2.43*** (0.39)
常数项	0.18*** (0.04)	0.37** (0.15)	0.28* (0.15)	0.29* (0.15)	0.140 (0.23)	-0.83*** (0.2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18	218	218	218	218	218
F (Wald)	10.08 [0.001]	6.870 [0.000]	6.250 [0.000]	5.500 [0.000]	4.710 [0.000]	10.30 [0.000]
Hausman p	17 [0.000]	233 [0.000]	115 [0.000]	153 [0.000]	21193 [0.000]	846 [0.000]
R^2 -within	0.0500	0.100	0.120	0.130	0.130	0.280

注:(·)内为标准差,[·]内为 p 值,*、**、***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在回归 2 中 L_{of} 系数由回归 1 中的显著为正转向为负,且在 10% 水平上统计意义显著,而市场化指数 M_k 与 OFDI 的交互项在 5%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 OFDI 对地区贸易的促进效应依赖于该地区制度环境。在回归 3 ~ 回归 6 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OFDI 系数显著为负、市场化指数与

3.1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1 和表 2 的实证结果与前述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约束的存在会大大弱化 OFDI 的贸易效应,甚至导致 OFDI 贸易效应为负;相应地,不断地降低本地区的制度成本,将会有效地促进该地区 OFDI 的贸易效应。观察表 1、表 2 中回归 2 ~ 回归 6 的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指数(M_k)与 OFDI 流量和存量的交互项 M_{kof} 、 M_{kofc} 均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地区制度成本越低则 OFDI 在该地区的贸易效应就会越强。

表 1 给出了制度成本、OFDI 流量对地区贸易的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方程均采用标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回归 1 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 L_{of} ,回归 2 引入了市场化指数 M_k 以及对外直接投资 L_{of} 的交互项,以考察制度成本对 OFDI 贸易效应的影响,回归 3 ~ 回归 6 逐步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在回归 1 的结果中 L_{of}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 OFDI 有利于促进本地区进出口贸易,即 OFDI 规模越大本地区对外贸易将越多;这一结论与文献[3]的研究结论一致。本地区企业走出去实施海外投资,可能会通过带动本地区生产设备、服务贸易以及配套设备等的出口,带动进出口贸易增长,产生贸易效应。

OFDI 交互项显著为正的结果依然保持不变,这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不断对本地区制度环境予以完善、提升,各地市场化进程也得以稳健推进,制度成本不断下降。1) 这会改善地区与地区之间、地区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升整体

效率^[21]. 而且, 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环境越好的地区, 本地区的企业竞争能力就越强, 则走出去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会带动更多本地企业的进出口. 2) 市场化越高的地区会存在更多竞争力强的垂直型 OFDI 企业走出去, 它们生产中间品而不是最终产品, 进而带动本国零部件、设备的出口, 产生贸易效应^[10]. 3) 若制度质量较低(存在制度约束),

则容易迫使本土企业实施逃逸型对外投资, 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一部分外资的贸易效应是较弱的^[13]. 因此, 从走出去投资的投资动机与类型角度来看, 制度成本的降低将有利于提升 OFDI 企业的竞争力、促进 OFDI 对本地区的贸易效应及逆向溢出效应.

表 2 制度成本、OFDI 存量与 OFDI 贸易效应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L_{ofc}	0.01*** (0.00)	-0.03* (0.01)	-0.0200 (0.01)	-0.02* (0.01)	-0.04** (0.02)	-0.06*** (0.02)
M_k		-0.0200 (0.03)	-0.0200 (0.03)	-0.0300 (0.03)	-0.0500 (0.04)	-0.12*** (0.04)
M_{kofc}		0.004* (0.00)	0.004* (0.00)	0.005** (0.00)	0.006** (0.00)	0.011*** (0.00)
G_{gdp}			0.58* (0.31)	0.58* (0.31)	0.65** (0.32)	0.67** (0.29)
F_{gdp}				-0.001 (0.00)	-0.001 (0.00)	-0.002* (0.00)
L_{gdp}					0.150 (0.14)	0.28** (0.13)
I_n						2.29*** (0.39)
常数项	0.13** (0.06)	0.41** (0.17)	0.30* (0.18)	0.33* (0.18)	0.170 (0.24)	-0.63** (0.2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F(Wald)$	9.340 [0.002]	6.730 [0.000]	5.960 [0.000]	5.280 [0.000]	4.580 [0.000]	9.600 [0.000]
Hausman p	17 [0.000]	142 [0.000]	74 [0.000]	92 [0.000]	195 [0.000]	124 [0.000]
$R^2 [within]$	0.0500	0.0900	0.110	0.120	0.130	0.260

注: (·) 内为标准差, [·] 内为 p 值, *, **,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从表 1、表 2 估计结果的回归 2 和回归 6 来看, OFDI 的符号显著为负, 而 OFDI 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在控制了地区制度成本的条件下, OFDI 对本地区的贸易推动效应不再为正, 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面效应. OFDI 与制度成本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降低地区制度成本将会有效地增强 OFDI 在该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 同时这说明, OFDI 对母国的贸易效应依赖于母国制度成本. 通过改善地区制度环境, 有效地改善了走出去企业的投资类型和所属行业, 同时, 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了制度逃逸型 OFDI; 进而形成 OFDI 对本地较强的贸易效应. 在分离出上述效应之后, OFDI 企业可能就只剩下了通过走出去转移本地区生产能力, 进而减少本地出口、同时减少本地区对外部的进口等最终形成了对本地负向的进出口贸易效应. 因此, 为更加有效地发挥 OFDI 对母国(地区) 的逆向溢出以及贸易促进效应, 应该从优化东道国(地区) 的制度环境入手, 突破“制度门槛”, 更有效地促进 OFDI 的逆向溢出和贸易提升效应.

3.2 稳健性检验

出于稳健性考虑, 将表 1、表 2 分别采用市场中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代替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制度成本的代理变量, 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

果发现, 表 1 和表 2 中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都符合前述理论预期. 尤其是市场中中介组织的发育、法律制度环境与核心解释变量 OFDI(流量和存量) 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前文得到的“地区制度成本降低会强化 OFDI 的贸易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同时, 在控制了地区制度成本的条件下, OFDI(流量和存量) 的符号显著为负. 此时, OFDI(流量和存量) 对本地的贸易促进效应转变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进一步证实了理论预期与实证结果的一致性, 并且上述核心实证结果不会受到变量度量方式、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影响, 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已有的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这个现象^[2]. 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 这种走出去的贸易效应如何? 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跨国投资企业所处的母国制度环境这个关键因素在推动企业走出去中的重要影响. 本文从 OFDI 流出的母国(地区) 制度成本这个关键因素入手, 创新性地将 OFDI 投资动机理论与制度成本纳入到统

一的分析框架中,阐明了制度成本对 OFDI 投资动机、逆向溢出的具体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成本作为最基本的环境约束,对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方式、组织行为以及经济绩效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母国制度质量的提升将会决定 OFDI 的行业分布与类型,影响 OFDI 企业的投资动机及其国际化战略,进一步通过影响 O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与母国的经济联系,最终形成对 OFDI 贸易效应的影响。与此同时,制度约束可能导致制度逃逸型 OFDI,加上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约束,会对弱化 OFDI 的贸易效应产生叠加效应。因此,制度约束的存在可能导致 OFDI 难以发挥其对本地贸易的促进效应,甚至有可能将这种效应变为负值。与之相反,本地区制度成本的降低,将有助于提高垂直型 OFDI 企业走出去的比例、强化 OFDI 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强化 OFDI 对母国(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OFDI 对母国(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

2) 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制度成本的条件下,OFDI 对本地区的贸易提升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母国(地区)制度环境在 OFDI 发挥逆向溢出、贸易效应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可能是现有诸多未考虑母国(地区)制度环境条件下 OFDI 与贸易增长文献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本原因^[4-7]。OFDI 对母国(地区)的贸易提升效应依赖于当地的制度环境改善,随着地区制度成本的降低,将显著增强 OFDI 在该地区的贸易带动效应。

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1) 建立并完善各地区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疏通 OFDI 对本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促进渠道,提升 OFDI 的贸易效应,形成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比翼齐飞的双向开放态势,推动中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与投资大国的战略转变。

2) 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改善地区制度的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对于促进对外开放与国内经贸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23]。必须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努力降低各省制度成本,主要可从近期国务院提出的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市场化改革入手,从根本上消除地区制度约束,降低地区制度成本,以更好地促进 OFDI 对各省的贸易带动效应。

5 参考文献

- [1] Buckley P J, Cross A R, Tan Hui, et al.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48(6): 715-748.
- [2] 裴长洪, 郑文. 国家特定优势: 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 [J]. *经济研究*, 2011(11): 21-35.
- [3]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J]. *经济研究*, 2014(5): 160-173.
- [4] 胡兵, 乔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系统 GMM 方法 [J]. *经济管理*, 2013(4): 11-19.
- [5] 王胜, 田涛, 谢润德.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10): 80-86.
- [6] 张春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6): 74-85.
- [7] 陈俊聪, 黄繁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3, 15(3): 58-65.
- [8] 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1, 91(361): 75-87.
- [9] Blonigen B A. In search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1): 81-104.
- [10] Blonigen B A.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 [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005, 33(4): 383-403.
- [11] 项本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J]. *财贸经济*, 2009(4): 77-82.
- [12] 聂爱云, 陆长平. 制度质量与 FDI 的产业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4): 80-86.
- [13] Witt M A, Lewin A Y.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579-594.
- [14] Meyer K E, Estrin S, Bhaumik S K, et 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1): 61-80.
- [15] Meyer K E, Mudambi R, Narula 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ntex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ultiple embeddednes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2): 235-252.
- [16] Peng Mike W, Wang Denis Y L, Jiang Yi.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5): 920-936.
- [17] Dunning J H, Lundan S M.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

- 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5(4): 573-593.
- [18]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M]. New York: W W Norton Co ,1981.
- [19] Ang S H ,Benischke M H ,Doh J P. The interactions of institutions on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10): 1536-1553.
- [20] 聂爱云 ,陆长平. 制度约束、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2): 136-145.
- [21]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11.
- [22]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 London: MIT Press 2003: 352-356.
- [23] 聂爱云 ,陆长平. OFDI、市场分割与国际贸易: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6 215(2): 115-121.

The Institutional Cost and the Trade Effect of OFDI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NIE Aiyun¹ ,HE Xiaogang² ,HUANG Ruojia³ ,HUA Mengqing²

(1.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njing Jiangsu 210094 ,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 and effect how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influence OFDI investment motive ,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 and how the institutional cost influence the trade effect of OFDI are discussed through combining the OFDI investment motivation theory , reverse spillover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angel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above mechanism is analyzed by using China's provinces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0.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e effect of OFDI f is no longer positive , or even to turn into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trolling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home country's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trade effect of OFDI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institution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 The trade effect of OFDI on the home country is implemented by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improved. There will be a remarkable increase of trade effect of OFDI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pening and the domestic economy.

Key words: institution cost; OFDI; trade effect; effect of institution threshold

(责任编辑: 曾剑锋)

(上接第 15 页)

Some Properties of Julia Sets of Blaschke Products

GAO Junyang , LI Tingting

(School of Science ,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 Beijing 100083 , China)

Abstract: The properties of Julia sets of Blaschke product function are mainly studied. A complet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a class of Blaschke products in parameter spaces is given.

Key words: Blaschke product; dynamical properties; Julia set

(责任编辑: 王金莲)